

中国城市贫困现象的实证研究

王 锴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摘 要:以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工具,可以化解城市贫困成因探究中个体视角和结构视角之争。通过理论演绎提出假设,即城市贫困源自个体与结构互动的失败,表述为个体的“结构化水平”较低。而“结构化水平”具体包括“个体资源”“结构资源”“个体意识”和“结构规则”四个方面。基于 CFPS 2016 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结合江苏省昆山市的个案研究,以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验证假设,从而得出实证结论:城市贫困是由个体较低的“结构化水平”所致,是一种个体与结构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城市贫困;成因;结构化理论;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8)011-061-0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8.011.00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力度不断加大,速度不断加快,成绩不断显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届时,当农村绝对贫困全面消除之后,更大规模、更复杂的相对贫困群体将突显出来^[1]。这些贫困群体大多以散点状分布于城市区域中,与集中连片的农村绝对贫困群体相比,其所处环境的整体经济水平更高,基础设施也更加完善。其中不乏许多身处经济发达城市如上海、广州,但自身却陷入极度贫困的群体。这体现出城市贫困与农村贫困的差别,城市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能够带动其区域内所有人的自我发展,没有实现“水涨船高”,一部分人在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中失败了。对这部分群体来说,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贫困差距,从相对贫困视角来看,其贫困深度将大于农村贫困。随着中国城市化率越过 50%,中国开始进入城市型社会^[2],这一问题将愈加凸显。因此,准确理解城市贫困的特点,把握其成因,探讨其对策,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下一步工作的难点和重点,也是中国贫困治理的新目标。

一、文献回顾

法国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其《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提出了“社会事实”的概念。“这类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3]25}它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是个体“结晶化了的生活”^{[3]33}。用这样的概念思考城市贫困,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城市贫困是“社会事实”吗?如果它是,则意味着城市贫困的成因是社会性的,是社会性成因在个体身上的表现。如果不是,表明城市贫困的成因是个体性的,属于个体生活实际

作者简介:王锴(1992—),男,汉族,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

遇。正如迪尔凯姆所做的自杀研究,是从个体行为中寻求社会原因,是观察不同群体的自杀率,并非探究每一个个体自杀的原因。也只有“社会事实”,才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学术界关于城市贫困成因的探讨,大致可分为个体视角、结构视角之争。在个体视角下,贫困通常被视作个人的责任,这类理论也有时也被描述成“归咎于受害人”(blame the victim)^{[4]486}。美国当代著名的自由主义政策科学学者查尔斯·莫里(Charles Murray)在他出版于1984年的成名之作《脱离实际:美国1950—1980年的社会政策》(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 - 1980)中,将贫困的原因归咎于贫困者自身,他认为,在美国实施的许多社会福利项目,都倾向于增加贫困,而不是减少贫困,因为这些福利项目创造一种激励短视行为的措施,这不利于长远利益^[5]。随后莫里在1994年与心理学家理查德·J.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联合出版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中,直接讨论了社会人口中的智商问题,他基于一种人类生态学的视角,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智商不足造成的,智商会对人的财富收入、工作表现以及婚姻产生多种影响^[6]。在他看来,人都是具有理性的,就单亲母子问题而言,问题关键在于女性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选择生育,而美国的福利政策正在鼓励这种行为。莫里甚至强调需要用“污名化”去迫使穷人工作^[7]。

结构视角强调使用结构或制度去解释贫困。该视角将贫困归因于其所处的社会制度(blame the system),认为个体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而非个体的无能,个体的贫困是社会制度在个体身上的反映。美国学者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通过对美国城市中内城区存在的暴力犯罪、非婚生育、女性户主家庭和福利依赖的问题的描述,指出这些现象这不能使用个体视角来解释,而应当基于城市经济体系的变迁,工厂手工业的衰落、就业郊区化和不断增长的低工资的服务业等因素来解释。另外如马克思的阶级论,以及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和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实际也属于结构视角的解释。国内有些学者将刘易斯等人的贫困文化理论理解为贫困是文化缺陷导致的,并将此归纳为“西方社会对贫困的傲慢与偏见”^[8],或是将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归结为个体主义范式的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文化理论过度强调贫困心理因素因而体现出一种观点,即穷人是懒惰的”^[9],本文认为这是有待商榷的。首先刘易斯和哈林顿同属左派^[10],其次正如吉登斯的评述,这些贫困文化理论的原初解释者是将贫困文化作为一种贫困的结果(consequence)而非原因(cause)^{[4]495}。

目前学界内最新的研究,包括国内学者对中国实践的研究,都强调一种中间视角,将个体视角和结构视角进行嫁接^[11]。既关注产生城市贫困的制度性因素^[12-14],也关注个体的能动性。^[15-16]综合来看,当前这样一种中间视角的解释,已逐渐成为对该问题研究的一种共识,这也是学术问题不断争论、思考不断深入、研究不断成熟的表现。但是基于中间视角解释贫困成因的系统性理论还不多,基本都处于宏观层面理念的探讨,而相关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这也是这一问题后续的研究方向。

二、理论与假设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可知,解释中国城市贫困的成因不能使用单一结构视角或个体视角,而应当使用一种“中间视角”。在这一方面,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通过对结构化理论的演绎,可以得出有关中国城市贫困成因的理论假设。



(一) 结构化理论与城市贫困

在讨论城市贫困成因的过程中,无论是结构视角还是个体视角,其实都是在将结构与个体进行二元对立。而这也是社会学理论界一直以来的一对矛盾争论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社会学理论界出现了将这二元对立现象进行整合的趋势,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通过对个体和结构的双向论证,指出结构兼具制约性和使动性,同时个体也具有主观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因此个体是行动的主体。基于此,吉登斯发展出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尝试化解社会学理论界对于个体与结构对立的长期争论。

所谓结构,就是一系列的权力与支配,它们控制、约束、维持、促进着个体的一切行为活动。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两个客体中介,那就是规则和资源。规则和资源的运行方式体现着权力的运行方式。具体来看,规则包括的表意性符码和规范性规则是规则存在的两种不同形式,“规则指行为的规范和表意性符码,其中规范包括政治、经济的法律制度,表意性符码则是具有意义的符号”^[17]。规范性规则和表意性符码在许多不同的学者研究中都存在不同的解读,笔者倾向于将规范性规范界定为是一系列正式的、人为设计的约束个体行为的规范,是明确的和可见的。而表意性符码则是个体或群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行为结晶”,是人们自发和无意间形成对自我的控制约束体制,并且人们自觉地遵从,如民俗、风俗、社会观念等。由此可见无论是规范性规则还是表意性符码,都是来自于人自身,因此也可以说,规则是人们自我设计的自我约束体制。

资源包括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是指“权力生成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物质产品,来源于人对自然的支配”。权威性资源是指“权力生成过程中所需要的非物质资源,来源于驾驭人的活动能力,是某些行动者相对其他行动者的支配地位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这两类资源的差别在于一个指对物的控制,一个指对人的控制。所谓结构化,是指“支配结构继续或转换的条件,从而也构成了社会系统再生产的条件”^{[18][80]}。正如吉登斯所说,规则和资源不是分开的,“不能脱离资源来谈规则”^{[18][80]}。在笔者看来,所谓规则就是通过控制资源的方式来影响人们自身,规则是人自我创造的,但资源不一定是,因为资源也可能是客观自然的产物。

因此,在城市贫困问题的解释上,吉登斯的结构与结构主义者的结构是有区别的。结构主义者通常将结构狭义地理解为经济结构或社会政治结构,总之是外在于人的一种控制力量。但吉登斯的结构中自然地就包含着人自身,因为结构是人自我设计出来的。

在吉登斯看来,个体之所以能够参与社会结构的创造,是在于个体的具有意识。吉登斯将人类的意识分为实践意识、话语意识和无意识。所谓实践意识就是人类知晓有关行动的社会条件并且就这样去做了的意识。而话语意识是比实践意识更高一层的意识,行动者不仅知道如何去做,还能用语言形容出来并进行自我反思。例如对自我行动状态的描述,行动的好与坏能做出判断等。个体有意识去参与行动,但也受到结构的制约。结构并非是居高临下的,相反,对于个体行动者而言,在行动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建构、加强和稳定着结构。在个体与结构之间表现出一种“二重性”,这两者是双向建构,双重整合的。吉登斯认为,个体的意识同时受到其所处时空的影响,这就产生了区域化和例行化两个概念^[19]。所谓区域化是指在统一的场域里,社会群体保持着内部统一的均衡,而与其他场域的群体则产生分化。例如语言就是一种区域化的产物,不同语言区的群体由于不同语言的组织形式,而具有了差异化的思维方式。另外,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风俗、乡俗和交往习惯等。

总之,从结构化理论的个体意识层面来看,城市贫困的成因中有个体行动者自我选择的因素,当然也可能是个体无意识造成的。但无论如何,结构化视角下的个体意识是与个体主义视角的贫困解释有较大区别的。个体主义视角将贫困完全看作个体自身责任,但在结构化理论下,个体之所以如此所思和所为,既具有自身缘由,也受到来自社会结构的影响,使其有时不得不如此所思和所为。结合前述对结构层面的探讨,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在结构化理论看来,城市贫困源自一种二重性的原因,是个体与社会结构互动的结果。

(二)理论本土化与假设提出

中国当代的城市贫困应当可以确定地说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而突显出来的问题。如上述分析,结构化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城市贫困,那么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这一解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结合结构化理论,本文认为中国城市贫困成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1. 结构规则缺乏

结构规则是指结构层面的规范性规则和表意性符码。在城市贫困问题上,通常表现为一系列不利于穷人的制度、政策、以及社会惯习。这些规则直接作用在结构资源上,对个体造成一种剥夺。例如户口制度作为一种规范性规则,它作用在教育资源上,使得部分群体因此规则而缺乏足够的教育资源。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而下岗的职工,就是由于在结构规则层面的缺乏,使其被排斥在工作岗位之外,丧失了原有的各类资源。在家庭层面,许多家庭内部的规则直接影响着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也受到社会结构层面的制约,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资源获得。正如许多学者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贫困时表示,中国传统社会的贫困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来自家庭的帮助。个体如果不符合这些结构层面的规则,或者说在这些规则下处于不利状态,就会表现出与结构的不相容,比如无法融入家庭、无法融入社区、无法被当地政府接纳等,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排斥。

2. 结构资源缺乏

结构资源是指个体从结构层面所获得的资源,这类资源生产者包括家庭、政府和社会等,在资源生产出来之后,基于结构规则进行分配。个体对这类资源占有量的多少,直接导致个体福利程度的高低。例如社会保险资源,由于不同的个体基于不同的结构规则所获得的社会保险资源量存在区别,有的地区社会保险制度完善,待遇水平较高,则社会保险资源量获得较为充足,从而贫困程度较低。反之,有的个体因为不利于自己的结构规则,被排斥在政府和社会之外,无法获得充足的社会保险资源量,从而造成自身的结构资源量相对匮乏,陷入贫困。

3. 个体资源水平较低

个体资源是指个体自身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个体资源量的多少决定了个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和到与社会的互动中去。例如当前中国城市中比较普遍的因病致贫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个体因病而需要花费大量的医疗费,但又得不到有效的医疗保障,即在结构资源上的占有量较低。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个体因病而无法参与工作,无法参与到与社会的互动中去。个体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自身的因素,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它所造成的情况就是,两个在相同结构规则下占有相同结构资源量的个体,依然可能会出现一个陷入贫困而另一个则较为富有。因此,个体资源的水平也是在结构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



4.个体规则(意识)水平较低

个体规则也可表述为个体意识,它是个体如何运用自身资源的方式,也是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和对行动的意识与安排。它包括个体的实践意识(也就是行动意识),也包括个体的话语意识(即自我认同)。当个体的自我意识较为充足时,他会根据自身所处的时空环境,对自身当下及未来有明确的认识,并且会指导自己如何积极参与到结构化的过程中去。而当个体意识欠缺时,往往会表现出焦虑、自我否定、缺乏生活的信心、缺乏行为意识、缺乏工作动机等,安于现状,不愿意去改变。例如在我国有些地区出现的“福利依赖”问题,就业年龄段人口主动失业,甚至出现“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的好吃懒做现象。这是个体自我意识的缺乏,缺乏主动去获得和使用资源的意识。另一方面,也缺乏对自我的认知,不能认识到自己的行动能力和潜力。这会造成个体主动放弃参与到结构化的过程中去,而甘心被当作结构支配的客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依据结构化理论所提炼出的个体-结构、规则-资源这两条主线,做出一个二维四面的类型学分析图(如图1所示),至此,结合前文所述,本文提出假设:城市贫困源自因个体较低的“结构化水平”,它具体包括“个体资源”“个体意识”“结构资源”“结构规则”四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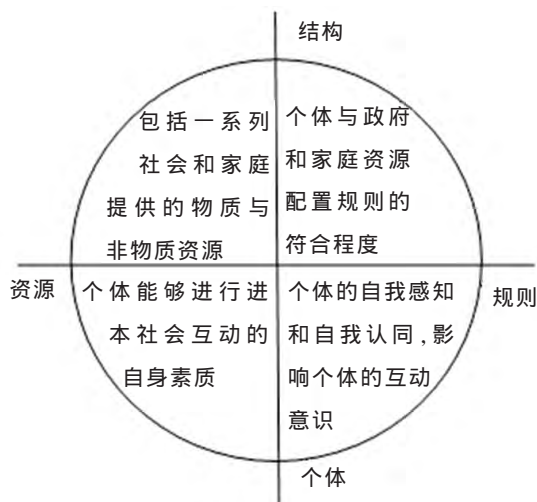


图1 以“结构化水平”解释城市贫困的二维类型学分析

三、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实证

本文假设中国城市贫困的成因是个体的“结构化水平”较低,这是运用结构化理论对中国城市贫困进行的理论演绎所得出的结论。但这一假设是否符合实际呢?因此本文继续通过量化实证的方法,首先对假设进行操作化,而后运用CFPS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

(一)数据与方法

本文的基本方法论是唯物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本逻辑为演绎法。首先在实践经验中提出问题,而后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理论解释并进行理论演绎,产生基本假设,进而通过实证数据分析验证假设,回应理论。本文的数据来源为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的调研数据。该数据是两年一期的追踪调查数据,基线调查于2010年4月开始,2011年2月结束^[20]。覆盖了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分层多阶段抽样设计使得样本所在区域人口数占到全国的94.5%,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微观综合性社会调查数据^[21]。该数据库中的成人数据库和家庭数据库比较符合本文的需要,因此本文选择将这两个数据库进行单独与合并共同研究。在资料分析技术上采用了SPSS 17.0、STATA 12、AMOS 21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构方程统计模型分析。

(二)相对贫困的测量——因变量的构建

综合文献研究,基于城市相对贫困的特点,本文认为采用相对剥夺的概念来进行贫困测量较为贴切。其中卡瓦尼(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具有无量纲性、正规性、转移不变性等优良性质^[22],而被解释变量也是无量纲的,基于这些优点,本文采用卡瓦尼指数来测量相对贫困。其公式是:

$$RD(x, x_i) = \frac{1}{n\mu_x} \sum_{j=i+1}^n (x_j - x_i)$$

公式含义是,在总群体 X 中,有 n 个样本,其所有人的收入均值为 μ_x ,将收入水平从低到高排列,则第 i 个人的收入相对剥夺可以记为 $RD(x, x_i)$ 。通过这一公式可以看出,其实际的含义是,个体与其所在群体中,所有比其收入高的人的差值和,与群体所有人总收入的比。因此对于个体来说,其相对剥夺程度主要是靠其在总群体中的排序位置以及与他人的差距所决定。依据这一公式可以得出每一个人的 RD 值,是一个介于 0~1 之间的无量纲数值,当 RD 值等于 1 时,表示完全剥夺,其在群体中的处最末位,当 RD 值等于 0 时,表示完全不存在剥夺。这一方法相对于相对贫困线法,优势在于克服了以一条绝对线将总群体分为“穷人”和“非穷人”两个群体的局面,而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对应给出一个 RD 值,通过 RD 值的大小,反映其相对剥夺情况,相比于贫困线法,更加柔性,也更有利于对单个个体进行测量。

依据这一方法,本文对 CFPS 2016 数据库中的城市居民进行了测算。首先对成人数据库和家庭经济数据库按照家庭编号进行了合并,在选择城市居民和剔除部分无效样本后,得到总样本含量 $n=15307$ 个。而后依据文献和实践经验,将因变量 Y 表述为“经济相对剥夺”(潜变量),具体包括 y_1 = “家庭人均收入 RD 值”、 y_2 = “家庭人均金融资产 RD 值”和 y_3 = “家庭人均房产 RD 值”三个观测变量。

(三)探索性因子分析——自变量的构建

1. 指标构建

本文的假设是“结构化水平”是造成贫困,即经济相对剥夺的成因。因此需要根据结构化理论下提出的具体因子(潜变量),找出合适的指标(观测变量),以构建自变量体系。由于目前关于结构化理论的研究并无将其量化处理的成果,无法为本文进行指标选择和分类提供有效参考,韩莹莹的研究虽然列出了结构化各要素与城市贫困的关系图,但并没有给出数据论证^[23]。所以本文选择首先进行初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在筛选完指标后再进行二次因子分析,以得出有效的结果。

根据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决定个体是否贫困的因素是个体的“结构化水平”,包括“结构资源”“结构规则”“个体资源”和“个体意识”。因此,本文认为如果要将结构化理论与我国城市贫困研究结合起来,需要具体考察这四个区域在现实中的表现和具体指代的内容。

根据理论分析和问卷数据的实际情况,本文在综合 CFPS 成人和家庭两个数据库后,并在请教有关专家的基础上,初次构建了 24 个指标,其中个体层面指标 9 个,结构层面指标 15 个,指标构建结构如表 1。

2. 初次探索性因子分析

将指标对应的变量导入 SPSS 17.0 软件,首先对各个指标进行峰度-偏度的正态分布检验,得出每个指标都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再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得到每个指标的 sig 值都小于 0.05,也就



表 1 相关指标构建说明

类别	指标	测量内容与形式	赋值	使用说明
个体层面	客观健康	访员通过健康状况测出	1,2,3,4,5,6,7,	直接测量
	健康感受	自答: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不健康	5,4,3,2,1,	直接测量
	基础智商	访员通过智力水平测出	1,2,3,4,5,6,7	直接测量
	理解能力	访员测评	1,2,3,4,5,6,7	直接测量
	预期感受	自答:通过对自我未来的信心程度反映	1,2,3,4,5	直接测量
	生活感受	自答:通过对自我生活满意度反映	1,2,3,4,5	直接测量
	工作认同感	自答:通过对工作的满意度反映,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	1,2,3,4,5	简单加总
	基础情商	访员通过被调查者待人接物水平测出	1,2,3,4,5,6,7	直接测量
	沟通表达	访员语言表达能力测出	1,2,3,4,5,6,7	直接测量
	教育资源占有量	自答:通过学历反映:文盲,小学,初中,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	1,2,3,4,5,6,7	4次 CFPS 数据整合汇总
	社会文化资源占有量	自答,通过过去 12 个月阅读反映	1,2,3,4,5,6,7	阅读量观测值 7 分位划分
	政治信息资源占有量	自答:每周报纸电视广播了解政治信息的频率,每周网络了解政治信息的频率	1,2,3,4,5,6,7	对不同方式了解政治消息的总天数相加计算,再按 7 分位划分
结构层面	家庭规模	自答:所在家庭人口数	1,2,3,4,5,6,7, 8,9,10,11,12, 13,14	直接测量
	配偶教育资源占有量	自答:文盲,小学,初中,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	1,2,3,4,5,6,7	4次 CFPS 数据整合汇总
	家庭颀部融合水平	自答:通过与父/母关系,联系频率,与子女(3 位以内)关系,联系频率共同反映	1,2,3,4,5,6,7, 8,9,10	先对关系以 1~5 赋值,对联 系频率以 1~7 赋值,再将关 系与对应联系频率相乘,而 后加总,缺失值记为 0,再对 总得分按 10 分位划分
	政府互动水平	自答:受到政府不公,与政府干部发生过冲突,到政府办事被拖延,遭到政府不合理收费	1,2,3,4,5,6,7	按照“是”为 0,“否”为 2 赋 值,而后按加总后总得分的 7 分位划分
	社会融入水平	自答:因贫富差距遭到不公,因户 籍受到不公,因性别受到不公,与 所在小区邻里关系,是否会有邻 居帮忙,对所在小区的感情	1,2,3,4,5,6,7	对问题按照 1~5 赋值,以及 “是”为 0,“否”为 2 赋值,加 总计算后按总得分的 7 分位 划分

转下页

续表

类别	指标	测量内容与形式	赋值	使用说明
结构层面	身份资源占有量	自答:是否是党员,是否是团员; 是否是工会成员,是否是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员	1,2,3,4,5,6,7	对每项以不同权重分别赋值后加总,再对总得分按7分位划分
	家庭社会关系构建	自答:所在家庭过去12个月人情往来总支出	1,2,3,4,5,6,7,8,9,10	按总支出的10分位划分
	社会地位自评	自答:个人总收入在本地的地位自评	1,2,3,4,5	直接测量
	养老保险资源占有量	自答:离退休后在机关事业单位领取,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老农保,新农保,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10,7,1,3,3,4,6	直接加总
	医疗保险资源占有量	自答: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上都没有	10,7,5,2,5,0	直接加总
	家庭风险意识	自答:家庭商业保险年支出额	1,2,3,4,5,6,7,8,9,10	按总支出的10分位划分
	家庭教育资源	自答:家庭教育培训年支出额	1,2,3,4,5,6,7,8,9,10	按总支出的10分位划分

是说在95%的置信区间下,样本存在显著差异,数据有效。而后将数据导入因子分析,得出KMO检验值为0.844,比较接近1,说明矩阵是正定的,所选择的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不存在明显共线干扰项,而Bartlett的sig值为0,小于0.05,说明分析的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共提取了7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56.575,贡献率不高。根据旋转成份矩阵具体来看,因子载荷最低的三个因子,单个对总体的贡献率低于5%,并且一共只包含着5个变量,分别是:家庭教育资源、家庭内部融合水平、家庭社会关系构建、家庭风险意识、家庭规模。可以看出,这五个指标都属于结构层面,并都与家庭有关。

初次因子分析显示家庭层面的几个指标不能与其他指标共融,要求将其剔除。但这到底是否是事实?抑或数据收集或统计分析出现了问题?需要进一步结合实践进行研究与思考。

3. 二次因子分析与指标分类

为了进一步研究,本文根据初次因子分析的结果对指标进行了整理,将家庭内部融合水平、家庭规模、家庭教育资源、家庭风险意识以及家庭社会关系构建这五个指标剔除,而后进行二次因子分析。其结果与初次类似,KMO值接近1说明矩阵正定,sig值为0.00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公因子4个,相比初次因子分析,单个因子的载荷量有所提升,具体数据如表2。所得结果已基本符合预期和理论假设。

4. 结果解释与因子命名

根据二次因子分析结果,结合本文对结构化理论的演绎阐释,可以将四个因子按照个体-社会、资源-规则(意识)这两个维度进行划分,并分别命名为:F1=个体资源、F2=结构资源、F3=个体意识



和 $F4$ =结构规则。

“个体资源”因子主要反映了个体参与结构互动的必要自身条件,是个体能否理解社会规则、获取社会资源和产生个体意识的基础,包含 $ax1$ =基础智商、 $ax2$ =基础情商、 $ax3$ =沟通表达、 $ax4$ =客观健康以及 $ax5$ =理解能力。

“结构资源”因子包括 $bx1$ =教育资源占有量、 $bx2$ =养老保险资源占有量、 $bx3$ =医疗保险资源占有量、 $bx4$ =身份资源占有量、 $bx5$ =政治信息资源占有量、 $bx6$ =社会文化资源占有量以及 $bx7$ =配偶教育资源占有量,共 7 个指标。这 7 个指标共同反映了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结构资源占有量,决定了个体与社会互动程度的高低。

“结构规则”是结构运用资源控制个体的方式和途径,由于没有直接的指标和变量可以对这些规则在不同个体身上的不同运行进行直接描述,因此本文对结构规则的描述侧重从结果的视角,认为可以通过结构规则在不同个体身上的运用的具体结果来反映它的差异,包括 $cx1$ =政府互动水平、 $cx2$ =社会融入水平、 $cx3$ =工作认可程度和 $cx4$ =社会地位。

“个体意识”是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和认同,当个体自我意识较强,表明个体有较高的本体性安全感,自我的发展较为稳定,包括 $dx1$ =预期感受、 $dx2$ =生活感受和 $dx3$ =健康感受三个指标。

(四)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因果关系的证明

1.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应用线性方程系统表示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以及潜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其实质是一种广义的一般线性模型^[24]。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第一步是根据理论画出结构关系图,以描述各个因子和指标之间的关系。做出如图 2 所示的结构关系图。本文使用的分析模型是递归模型,采用的参数估计方法是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

本文采用的结构方程运行软件是 AMOS 21,由于软件要求数据中不允许有任何缺失值,因而本文在上述二次因子分析时对数据进行了删减,最终得到有效样本数为 3 750 份。本文的观测指标共有 22 个,其中属于外生变量的有 19 个,属于内生变量的有 3 个。外生潜变量是个体资源、结构资源、个体意识和结构规则,内生潜变量是经济相对剥夺。

2.结果解释

将数据导入 Amos 21 软件,得到如图 3 所示的路径系数图。这是结构方程模型的第二步内容,也是核心内容。由于本文所采用的内生观测变量都是 0~1 之间的无量纲数值,而外生观测指标均为 1 以上的整数,直接比较系数的大小无意义。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化系数输出,其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个体资源、结构资源和结构规则三个因子对经济相对剥夺都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并且 P 值显示在 99.9%的置信区间内是显著的,结果可接受。而个体意识因子却与经济相对剥夺表现出正向影响的关系,意味着个体本体性安全感越高,经济剥夺情况反而越糟糕,这与我们生活实践和理论假设都是矛盾的,好在数值很小,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这一结果也可以拒绝。我们将此结果中四个因子对经济相对剥夺的影响指数相加再乘以因子分析中的累积载荷量,可以得到个体的“结构化水平”这一潜变量对经济相对剥夺的影响指数,经计算,该值为-0.5004。因此该模型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了本文提出的假设,即个体“结构化水平”对经济相对剥夺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结构化水平”提高一个单位,经济相对剥夺将下降大约 0.5 个单位。

表 2 二次因子分析 19 个指标旋转成份矩阵

	1	2	3	4
基础智商	0.904	0.120	0.045	0.037
基础情商	0.883	0.064	0.061	-0.004
沟通表达	0.881	0.140	0.028	0.043
客观健康	0.869	0.116	0.005	0.087
理解能力	0.651	0.229	-0.117	0.063
教育资源占有量	0.238	0.718	-0.122	0.146
养老保险资源占有量	0.051	0.694	0.185	-0.250
医疗保险资源占有量	-0.003	0.670	0.222	-0.230
身份资源占有量	0.066	0.601	0.118	0.015
政治信息资源占有量	0.173	0.554	-0.136	0.224
社会文化资源占有量	0.087	0.477	-0.245	0.260
配偶教育资源占有量	0.126	0.473	-0.041	0.060
政府互动水平	0.001	-0.024	0.657	-0.060
社会融入水平	0.034	-0.064	0.583	0.144
工作认可程度	-0.021	0.064	0.516	0.230
社会地位	-0.003	0.243	0.369	0.332
预期感受	0.057	0.006	0.336	0.704
生活感受	-0.002	0.047	0.505	0.596
健康感受	0.083	0.005	0.017	0.588

在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中,最后都需要报告模型的拟合程度,它们是反映模型得到数据支持程度的体现。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卡方为 1 170.175,自由度 df 为 199,由此得到卡方与自由度之比为 5.880,一般来说,这一数值在 4~5 之间比较好。本文得到的结果虽然超过了 5,但距离 5 不远,同时有较大的样本量支撑,因而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RMR 值为残差均方跟,值越小代表误差越小。GFI 是拟合优度指数,一般要求大于 0.9。AGIF 是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也要求大于 0.9。RMSEA 是近似方差的均方根,小于 0.05 表示可接受。以上拟合指数都属于绝对拟合指数。CFI 是比较拟合指数,属于相对拟合指数,一般也要求大于 0.9。本文 CFI 虽然小于 0.9,但并没有进行不同模型比较研究的需要,同时综合绝对拟合指数,可知本研究的模型总体是可靠和有效的。

3. 非预期结果

通过标准化系数结果可以看出,结构资源、结构规则和个体资源都对经济相对剥夺具有负向影响,并且在 95%的置信区间里可靠。而各项指标对因子也具有很好的表现。但同时也出现了个体意识因子与经济相对剥夺不能有效拟合的情况,在拒绝原假设的情况下甚至表现出稍许的正向影响。这是在今后的数据指标选择以及模型构建上需要改进的。而这也是结构方程模型的局限之一,即只能验证假设,而无法提出假设。模型的建构需要依据理论假设,所以这里就会产生一组矛盾,即模型理论不能共同满足。但正如做结构方程的基本原理所说,“模型比较和修正的过程中,不应以追求模型指标的好坏为唯一目标,能否得到理论的支持才是更为重要的标准”^[25]。

因此,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量化研究上是不够的,这样很容易产生“伪回归”“伪理论”等情况,而是应该与质性研究结合起来。从这一点上说,本文所建构的结构方程模型虽然没能百分之百地验证之前提出的所有理论假设,但却验证了理论需要结合实际、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需要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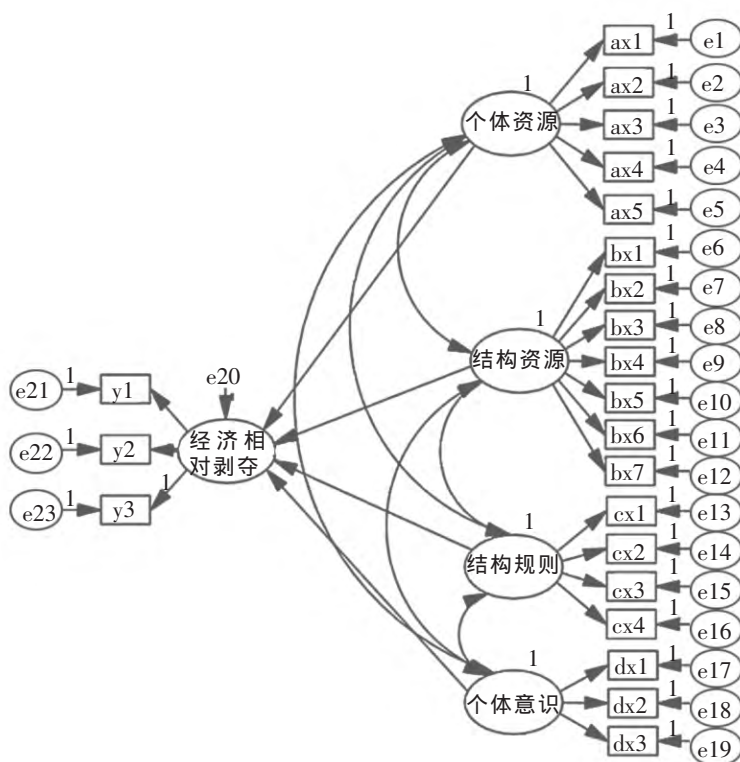


图2 经济相对剥夺与结构化水平结构关系图

合统一这一说法,因而也可以说是“失之东篱,收之桑榆”吧。

四、基于昆山市的个案实证

上述理论演绎和经验实证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本文的研究任务,得出结论城市贫困的成因源自个体的“结构化水平”较低。但结构方程模型中仍存在非预期性结果,个体意识是否会对贫困产生影响,以及各因子在现实中又是否成立,这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进行验证。本文拟采用个案研究法,选取全国最富的县级市昆山作为研究对象,以质性研究展开论述。

(一)总体概况

江苏省昆山市位于长三角经济圈,交通便利,经济发达,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百强县、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市之首。目前全市户籍人口80余万,常住人口240万。2017年,全市GDP达到3500亿元,这一水平甚至超过了宁夏、青海和西藏三个省级单位。我们选择昆山市这样一个经

表3 结构化模型的标准化输出结果及显著性P值

			Estimate	P
经济相对剥夺	<---	个体资源	-0.128	***
经济相对剥夺	<---	结构资源	-0.518	***
经济相对剥夺	<---	结构规则	-0.255	***
经济相对剥夺	<---	个体意识	0.067	0.174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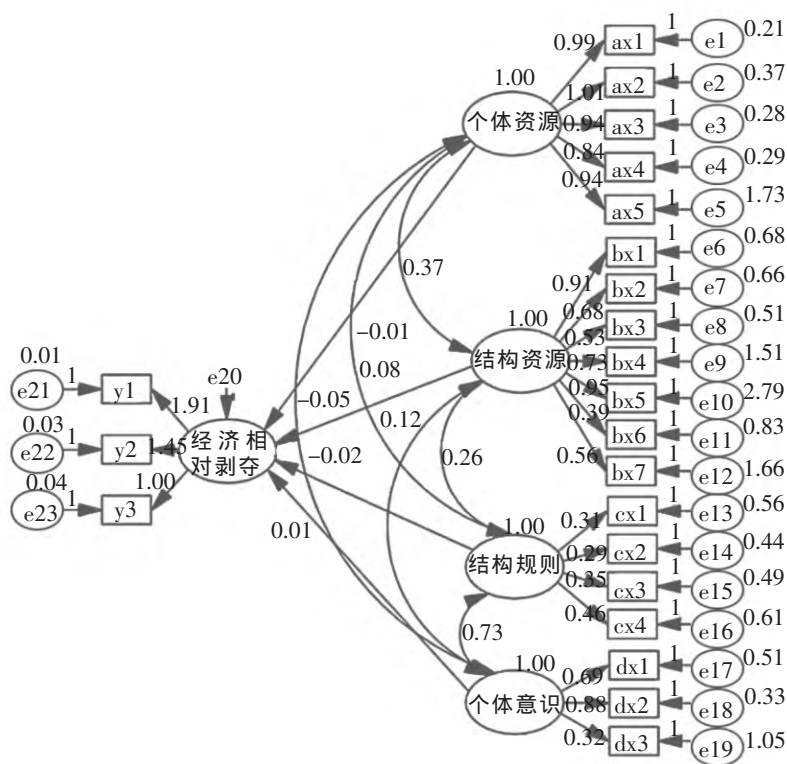


图3 经济相对剥夺与结构化水平路径系数输出图

济发达的区域作为分析对象,一方面因为城市贫困救助的资金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所以昆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目前城市贫困治理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全国其他地区城市贫困在之后经济发展中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昆山在2008年就实现了社会救助的城乡并轨,当地官方已将城市和农村贫困合称为“困难人群”,因此在昆山已无需特地强调“城市贫困”这一说法。当前昆山市2017年低保标准为875元/月,特困人员供养标准为1225元/月。根据江苏省的扶贫标准,人均年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需要进行建档立卡,针对性地进行扶贫工作。然而如果将这一标准放在昆山,那昆山市将无一人符合条件。通过访谈我们也可知,在昆山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之中,所谓的绝对贫困已经基本消除,而相对贫困却依然存在。同时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昆山的贫困标准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因此我国也存在较大的地域贫困差异。

“省里的要求是人均年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需要建档立卡,它其实是包含了救助资金的。但是如果包含了救助资金的话,我们目前低保金875元一个月,老早就超过这一标准了。这样的话我们昆山没有一个人要建档立户了,所以有的领导也一直说我们昆山没有绝对贫困了。但是相对贫困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就把政府的救助这块不算进去,把人均纯收入低于6000元的这部分人群纳入救助帮扶对象,也就是建档立卡对象。”

——昆山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工作人员

表4 模型拟合结果报告

卡方	1170.175	GIF	0.965
自由度	199	AGIF	0.956
χ^2/df	5.880	RMSEA	0.040
RMR	0.092	CFI	0.774

(二)基于结构化理论的昆山城市贫困成因分析:回应前文量化研究

1.“个体资源”和“结构资源”与贫困

根据前文量化分析,本文将城市贫困的成因实证解释为个体的“结构化水平”较低,但前文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对“个体意识”因子并没有给出有效解释,这样需要结合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全面分析。昆山市目前的贫困治理政策中将贫困对象主要划分为四类人群,即老、病、残、牢释和吸毒人员。这四类人群中,以疾病和残疾的比例最大,约占所有救助对象的90%。可见目前政府主要关注的贫困的表现是疾病和残疾,按照之前的分析,这两者都属于“个体资源”的匮乏。这也印证了量化研究结果,即“个体资源”因子对“结构化水平”的贡献在所有因子中最高。然而这只是一方面,个体因为自身身体的原因很难形成较好的“结构化水平”,但是如果“结构资源”因子“给力”,依然可以获得较高的“结构化水平”。例如有些群体虽然患有重病,但拥有较好的医疗保障,家庭能够给予较多的支持,那么这样的群体也很难被称为贫困群体,他们虽然患病在身,但依然能够与社会形成较好的互动。所以疾病和残疾并非贫困的成因,其成因是疾病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损耗,使其无法继续原有的工作获得稳定的收入,以及较大的医疗康复支出,甚至影响家庭成员的工作收入。

2.“结构规则”与贫困

昆山贫困群体中存在一类人数较少的牢释和吸毒人员。他们因为自身违法陷入贫困,很难像其他诸如生病和残疾群体得到社会的认同。社会多数人群认为这是“自作自受”,并且认为将缴纳的税作为他们的救助金是不合理的。

“我们目前对这类群体是严控,因为帮助他们会受到社会很大的非议。像他们有的虽然出狱后在劳动年龄范围内,我们也联系企业推荐就业,但是一方面目前政府的权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二是现在企业都是民企,自主权很大,他们不一定会愿意要这样的人。人家生病的那种贫困的大家都看得到的,也都能理解。他们拿救助是合理的。但是吸毒的那种群众就很难理解,也不同意帮助。”

——昆山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工作人员

由此可见,对于牢释和吸毒人员,即使他们能够改过是非,即使自身的“个体资源”良好,但也很难与社会形成良好互动,获得较高的“结构化水平”,因为他们的“结构规则”因子“拖了后腿”。由于社会的排斥,他们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由于社会舆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他们在政府的政策规则中也处于不利的位置,容易被排斥在社会和政府甚至家庭之外,陷入贫困。

3.“个体意识”与贫困

本文在上述的量化分析中还存在有一个遗留问题,即个体意识是否会影响贫困?昆山的救助政策中规定,对于劳动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低保对象,拒绝接受职业介绍并且未自行求职达6个月以上,或者连续3次拒绝接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职业介绍的,停发本人的低保金。这是在政策中为了促进就业,避免由于部分群体由于思想意识问题而产生的“救助依赖”。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一部分群体,由于自己的不幸遭遇深陷贫困,因而产生了悲天悯人的心态,对自己自暴自弃,不愿也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形成了“等、靠、要”的思想。还有一部分群体,认为低保政策的许多附带的救助项目比较实惠,因而在自己的收入已经超过规定标准时,也并不愿退保,甚至主动放弃工作而为了获得低保。

“许多困难群体都没有劳动能力,社会贫富差距的现实让他们产生了集体悲观、压抑的心理,甚

至导致自暴自弃,单纯依靠政府保障生活,缺乏积极参与社会、改善现状的勇气。还有就是许多的困难家庭接触最多的就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能提供的最多也就是一些安抚或者政府的一些经济上的援助。但有些困难家庭尤其是那些突发重病、重残的,在面对这种重大的人生变故时,绝望、崩溃的情绪蜂拥而至,基本上是很难接受的。有的会出现抑郁、焦虑或者其他的精神疾病,有的甚至出现自杀。那么还有一些困难家庭害怕他人的怜悯和社会的歧视,在平常生活中总是试探性地和他人交往,觉得自己比别人要矮一截。”

——昆山益加公益服务社工作人员

可见,在贫困者中,除了一些思想上“等、靠、要”而主观意愿上不愿改变,不愿脱离救助体系的人员,我们暂且称为主动的个体意识匮乏者之外,还有一些群体,他们由于对自己境遇的失望,对未来的不确定甚至无望。这样的情况不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行动,还影响到其结构规则等其他方面的结构化因子,如自己主动放弃社会参与或者社会融入,从而造成个体的“结构化水平”较低。正如有学者指出,城市贫困的大量贫困和返贫者,不仅仅是因为无助,也是因为无望^[27]。这样的群体我们可称为被动的个体意识匮乏者。他们也不希望自己身处贫困境地,也不希望一直依靠贫困救助而成为他人眼中的“弱者”,但是现实摧毁了他们的心理防线,只能被动地接受这样一种情况。因此不管是主动的个体意识匮乏还是被动的个体意识匮乏,在现实中个体自身的思想意识确实会产生影响。

本文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蓬曦社区现年46岁的居民张某,因患有尿毒症无劳动能力,妻子在社区打零工,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几年前,张某被查出患有尿毒症,需要长期进行血透治疗来维持生命。期间,面对生活的重担,妻子不断鼓励自己的女儿:“就是倾家荡产也会为你父亲治病。”张某在治疗期间,一直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同时经常组织病友一起活动,互相鼓励。女儿因家中突发变故导致中考发挥失常。高中期间,父亲鼓励女儿,不要放弃,要坚强面对。这给了女儿很大的激励,高考时,女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选报了医药专业,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所学来帮助家人,帮助更多这样的群体。张某患病期间,社区工作者多次进行走访慰问,关心病情,帮助申请了低保边缘医疗救助。并互相加了微信,随时保持联系,邻居也会在逢年过节自发地进行走访关心。2017年1月,昆山市精准救助帮扶政策向张某发放了2000元干股。所谓“自助者天助”。张某一家人积极乐观的态度,不但感染了自己的女儿,还感染了社区工作者和邻居。

张某一家人虽然因病在“个体资源”和“结构资源”上产生了损失,但是由于“个体意识”和“结构规则”的影响,给了他们“结构化水平”向上的拉力。而这一事例也补充了前文量化研究中的非预期性结果,即“个体意识”对贫困有负向影响力。

需要再次强调,“结构化水平”中的四个因子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这四个因子共同作用才能形成个体与社会的良好互动,才能有较好的“结构化水平”。现实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贫困并非仅仅源自单一因子影响,而是多个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会存在某一个或两个因子是其主要影响因子的情况。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现代城市贫困作为贫困治理的新目标,有着许多新特点和新成因。归纳来说,城市贫困表现为一种相对贫困,其成因是个体无法与周围的环境形成良好互动,个体的发展没有跟得上城市发展的步伐,表现为个体的“结构化水平”较低。本文认为,结构化水平具体包括了“个体资源”“个体意识”“结构资源”和“结构规则”,它们合力影响着个体的



“结构化水平”,从而影响贫困。只有正确理解城市贫困的本质和成因,才能在贫困治理上更有针对性。“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城市贫困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对新形势下贫困治理提出的更高要求。

参考文献

- [1] 林闽钢.新历史条件下“弱有所扶”:何以可能,何以可为?[J].理论探讨,2018(1):42-46.
- [2] 徐李璐邑,苏红键,韩镇宇,朱焕焕.不同国家应对城市贫困问题的经验及启示[J].现代经济探讨,2017(3):83-87.
- [3] 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4] Giddens Anthony. Sociology 6th[M].London: Polity Press. 2009.
- [5] Murray Charles.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M].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 [6] Herrnstein J Richard, Charles Murray.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M]. New York: The Macat Library. 2017.
- [7] 艾伦·迪肯.福利视角——思潮意识形态及政策争论[M].周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5.
- [8] 刘奇.贫困不是穷人的错[M].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47.
- [9] 党春燕.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基于社会互构论视角[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4:19.
- [10] 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M].李雪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
- [11] 李强.中国城市贫困层问题[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21-28.
- [12] 关信平.经济全球化、社会不平等与中国社会政策转型——兼论加入 WTO 后的新挑战[J].东南学术,2002(6):43-49.
- [13] 洪大用.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缺陷及其改进方向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3(2):134-139.
- [14] 唐钧.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制度[J].江海学刊,2001(2):46-51.
- [15] 李晓红.城市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分析——基于人力资本产权的视角[J].城市问题,2010(4):96-100.
- [16] Hong Zhaohui. The poverty of social rights and dilemmas of urban povert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5(45): 721-739.
- [17]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392.
- [18]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0.
- [19]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10-126.
- [20] 谢宇,胡婧炜,张春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J].社会,2014(2):1-32.
- [21] 李颖.风险沟通视角下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 学),2017(5):53-58.
- [22] 任国强,黄云,周云波.个体收入剥夺如何影响城镇居民的健康?——基于 CFPS 城镇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17(4):77-93.
- [23] 郭伟骁.个人所得税的个体福利效果分析[D].天津:天津理工大学. 2017.
- [24] 韩莹莹,范世民.结构化理论视角下城市贫困的致贫因素及作用机理[J].求索,2016(7):49-54.
- [25] 林嵩.结构方程模型原理及 AMOS 应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 [26] 吴瑞林,杨琳静.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思想、模型和实践[J].中国行政管理.2014(3):62-68.
- [27] Pinarciog.LU.M, Is.IK O. "Not Only Helpless but also Hopeless:Changing Dynamics of Urban Poverty in Turkey, the Case of Sultanbeyli, Istanbul",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8 (10): 1353-1370.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China's Urban Poverty

Wang K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Abstract: We can use an instrument , which is Antony Giddens's structuration theory,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explanation of the urban poverty cause between agent and structure perspectiv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cause of the urban poverty is the lower 'Structuration Level', which means the agent cannot get a good interaction with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deduction. The 'Structuration Level' consists of four elements, which are "structural regulation", "structural resource", "personal resource", and "personal awarenes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FPS 2016 to construct the structural model, and also do the case study of Kunshan city Jiangsu province. After that we can get the conclusion and verify hypothesis, which is that the "Structuration Level" can make a negative-effect to the urban poverty.

Key words: urban poverty; cause; structuration theory; structural model

(责任编辑:易晓艳)



重庆社会科学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18年第11期
总第288期